

陶瓷艺术与文人生活

孔铮帧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外陶瓷设计艺术丛书

TAOCI YISHU YU WENREN SHENGHUO

陶瓷艺术与文人生活

孔铮桢/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瓷艺术与文人生活 / 孔铮桢著. -- 重庆 : 西南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9

(中外陶瓷设计艺术丛书)

ISBN 978-7-5621-8934-3

I. ①陶… II. ①孔… III. ①陶瓷艺术-研究-中国
IV. ①J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5175 号

中 外 陶 瓷 设 计 艺 术 丛 书

陶瓷艺术与文人生活

孔铮桢 著

责任编辑：王 煤 徐庆兰

装帧设计：梅木子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400715

网址：www.x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0.5

字 数：31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8934-3

定 价：62.00 元

总序：从匠人手艺到当代设计

景德镇是一方神奇的所在,这里的陶瓷技术,历经千年传承,非但没有消散,反而精粹沉淀,葳蕤生光。表面上,景德镇许多瓷器作坊已经破败不堪,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大瓷厂风流云散,可是背后,处处都是卧虎藏龙,景德镇的工匠们就藏在这些破败所在的后面,他们随便在瓷器上画上几笔,就有清代大师的底蕴,把桩师傅们站在窑里一看,就知道这窑瓷器怎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长期以来,景德镇的陶瓷手艺在民间代代流传,形成了其手工中心城市中的地位。不管外面怎么风吹雨打,城市的内核始终没有变化,手工匠人们在景德镇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少有手艺精湛的师傅受雇于一个工厂主,他们流动于各家作坊之间,拿百家的钱,他们的地位,不比艺术家低下。

柳宗悦强调日本民间匠人的可贵,他们的技艺,他们的熟练度,他们和时代紧紧契合的审美,都决定了日本民间艺术在 20 世纪可以重新勃发出生命力。

这种可贵,在中国显得比在日本俏皮。中国的匠人们是流动的,不仅是职业属性,还有审美精神,他们并不凝固,随着时间到了现代,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匠人们分工细致,审美各异,他们做仿古瓷器尚有可为,可要是单纯依靠他们将瓷器带进一个新的审美系统,很难。过去的景德镇依靠的是督陶官完成这一系统,但是到了 21 世纪,这个系统早已经废弃近 200 年了,唯一可以带领景德镇走向新时代的,是现代设计。

设计,这个概念过去在景德镇是并不存在的。景德镇的主体,无论是匠人们还是工艺美术大师们,与设计的关系都比较遥远。但是好在景德镇历来是个包容性强大

的城市,在过去,是工匠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宫廷画家们远在京城,也能参与瓷器的设计,现在的情形也是如此:各个大学学习设计的学生们毕业后来到这里,许多外地的成名艺术家也在这里当作第二故乡,还不算景德镇陶瓷大学历年培养的人才们。这些新人与景德镇的老工匠系统构造了一个新的陶瓷世界,包括许多国外的陶瓷艺术家,也在景德镇一住多年。这些外来人才的进入,使得景德镇产生了巨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正在打开一扇与千百年前的景德镇发展不同的大门。

现代设计与传统的工匠精神最不同的一点是:除了熟练的手艺,还得有各种突破传统的奇思妙想。这种奇思异想,来自多年的审美积累,也来自四处的寻访调查,还来自这些设计者们永不疲倦的内心世界,正是他们的好奇心和多年的修习,造就了设计思路,开始在整个陶瓷世界(不仅仅是景德镇),取得自己的地位。五位当下研究者所写作的《当代茶器设计》《北欧陶瓷产品设计》《陶瓷艺术与文人生活》《手工陶瓷器皿》《英国陶瓷产品设计》《日本食文化与陶瓷餐具》《日本香文化与陶瓷香炉》七本著作,正是这一新趋势的体现。

王恺 资深媒体人,活字文化新媒体总监

第一章 清风霁月：文人的风骨与意气 001

- 一 文人的身份与定位 001
- 二 文人品格与艺术表现 003
- 三 文人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005

第二章 十日之饮：文人雅集中的情怀与品位 007

- 一 雅集的历史 007
- 二 艺术作品中的经典雅集场景 008
- 三 文人的溯古意识与器具品鉴 012

第三章 俨听松涛：文人的茶心与茶具 017

- 一 从药用到心境：中国人的饮茶历史 017
- 二 文人与茶 019
- 三 文人理想中的陶瓷茶具 023

第四章 燕居焚香：文人的香品与香器 031

- 一 从巫术到文心：中国人的用香历史 031
- 二 中国文人的香学理论发展 036
- 三 雅且秀：香具的形与制 039
- 四 文人生活与陶瓷香器的设计巧思 047

第五章 觞咏抒怀:文人的酒兴与酒器 055

- 一 酒的历史与意义 055
- 二 酒与文人的品格意象 059
- 三 酒器的发展与社会意义 061

第六章 萤窗拾趣:文人的书斋与文玩 075

- 一 自成天地的文人书斋 075
- 二 文玩的起源与发展 079
- 三 文玩的分类 082
- 四 明代文人笔记中的书斋陈设与文玩择选 101

第七章 瓶盆闲趣:文人的花器品位 105

- 一 从宗教到世俗:中国花艺的起源与普及 105
- 二 文人花艺理论的出现与发展 111
- 三 瓶花与盆花:独具品格的文人花艺形式 114
- 四 现代陶艺中的花器审美 126

第八章 叶石为照:陶瓷纹饰中的文人映像 131

- 一 顺治时期的“叶石纹”装饰风潮 131
- 二 “叶石纹”的起源与发展 142
- 三 中国文人的叶石情怀 150
- 四 叶与石的其他图像表达 154

第一章 清风霁月：文人的风骨与意气

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文人不仅是一个社会群体,还承担着时代风向标的责任,这就注定其身份的复杂性是无法仅用一句话便能概括的。也正因如此,后世对于这个特殊群体才始终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习所好往往成为映射社会大环境的明镜,特别是他们在艺术上的追求与推崇,更是对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文人的身份与定位

文人是历史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有可能是皇室贵胄中的一员,也有可能是每日荷锄耕种的平民,不过,无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权势有多么大的差异,能够跻身于“文人”“文士”的行列,就说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具有深厚的学识与高雅的品格,而且,这两者缺一不可,特别是品格的高低往往成为后世评判时参考的重要标准。

1. 历代文人的思想特征及社会背景

虽然历代文人无不因其才学而闻名,但由于社会政治背景的差异,我们目前认为每一个朝代的文人阶层都会展现出其特有的个性,所谓“魏晋士人的自适是反传统式的、思辨式的、贵族式的。……唐代文士也普遍有功利的色彩,是英才式的、狂放式的,而元末雅集文士则除了非功利性外还更带有雅致化的色彩。……宋代文士虽然缺乏唐人那种自豪感和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但其在政治上的主人翁意识和经济上的优厚待遇则比唐代文士要强烈和优厚得多”^①。此中所列虽不完整,但已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几个“文人”朝代,特别是其中的宋代文人,更是备受后世赞赏。宋代因有着肥沃的文学土壤,且自皇室始便有着重文轻武的倾向,至徽宗时尤甚,及至今天,人们依然习惯于将徽宗视作皇室文人的典型代表,以此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文人品格便格外的优雅,以至于被研究者评价为“(宋代)理想的文士应该优雅、博学、多思,具有艺术气质”^②。事实也证明了宋代文士传统对后世的深刻影响,特别是自明中期开始,文人们便将宋代文士视作典范与榜样,从文学、艺术、操守等各个方面进行模仿与学习。

对于今天的人而言,中国古代文人性格中最令人羡慕的莫过于他们的“真性情”。总的说来,文人们通常都有着率达坦然的性格,这一方面表现为他们会在各种应当严肃的场合,采用无伤大雅的方式娱乐自己及他人,例如欧阳修和他的五位同僚就曾在嘉祐二年(1057年)执掌进士试时以诗消遣,“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间以滑稽嘲谑,形于讽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绝

^① 牛贵琥,《玉山雅集与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金元文士雅集的典型解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12。

^② [美]伊沛霞,胡志宏译,内闳: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2。

倒”^①。以文做戏一直以来都是文人之间聊以怡情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他们不同于其他世俗民众的标志之一。更为有趣的是,一些知名文人还常因奔放自由的行为举止而成为独特的“街景”,如苏轼曾在《吉祥寺赏牡丹》诗中描写自己在36岁“高龄”时还会头插牡丹、醉倚同伴,奇怪的行为举止使得“十里珠帘半上钩”,不难想象,珠帘后的市民们对这位杭州知州疏狂的醉态必然是“啧啧称奇”的。在流传下来的各类文献中,我们也不难见到那些描述文人怪癖的记载,这些恃才傲物的“怪人”们或是如倪瓒一般有严重的洁癖,或是如米芾一样对某些难得的艺术精品有着强大无比的执念,此类趣事也令这些“天才”们的形象更为立体,也更富生活趣味。

2. 隐逸——文人生活的关键词

在现有的广泛认知中,多会认为古代士人的生活都呈现出类似于“采菊东篱下”那样清贫守节的景象,但纵观历代文献,这显然不是全貌。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士人不应当从事农业生产,然而事实却表明,许多退隐山林的高士最终依然选择了农耕生活的形式,以保障自己的基本衣食。文青云对此给出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解释:“许多隐士选择从事农耕,等于是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敞开的最为现实的路线。……隐士们之所以迁居到荒凉的地方,或许就是一件跟国家向处女地殖民的政策有关的事,……一个人退隐的地方越是偏远,对其占有土地就越不会有异议。更进一步说,既然政府对个人的要求决不会仅仅因为个人选择置之不理而自动终止,因为躲避到山林中偏僻的地方,也可以作为一种逃避税务官和征召、监督服劳役的官员们注意的办法。”^②在面对纷扰的社会现实时,他们会因个人的喜好而选择不同的处世方式,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隐逸”以及随之而来的“出世”与“入世”之辩。

文人的隐逸思想常常表现为两个发端:其一常见于改朝换代之时,特别是异族统治开始的时候,许多遗民都会以“出世”“隐逸”来表达反抗的思想;其二则多见于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下,此时文人多出于超然淡泊的心态选择隐逸避世的生活,来追求心态的平和,凸显自身的品格,是发自内心的对自然本真的崇拜。目前所知最早的有关于“隐逸”的记载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尚书》中有关于“四岳”和“微子”的记载便可被看作是贤者谦恭让位以及远离庙堂的行为展示。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易经》中诸如“遯”卦可能也表示出早期的隐逸观念,虽然这有一些类似于明哲保身的概念,但在“十翼”的注释下,它与之后那些哲学层面上的“隐逸”观多多少少有些相似。此外,《诗经》与《庄子》中那些描述官途险恶的文字也可被视为是对“隐逸”思想的另一种赞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士的隐逸思想实际上并非如后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完全精神层面上的行为,在很多时候,他们之所以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往往是因为社会现实的影响,使得他们不得不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甚至于,有一些道德低下的人还会尝试以这种方式沽名钓誉。所以说,真正的隐逸包含两个关键信息:其一,身体上的隐逸,即隐逸者多数远离人群而居,特别是早期的隐士,他们甚至于选择居住在深山之中;但也有一些为人称赞的隐士一直都居住在闹市之中,所谓“大隐隐于市”,即精神上的隐逸,此为其二。因此,能否成为真正的隐士主要还是取决于第二个因素。孔子在谈到人的品格时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即将“义”放到了首位,也就是说,君子应当对世事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道德观。他的这一观点同时也表现在有关于“出世”和“入世”时机的选择上,事实上,从孔子开始,中国的大部分文人们并不排斥服务于君主,但他们在对君主的选择上有着十分明确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则常常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孔子所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原则,为此,他宁愿选择周游列国,以试图选择一个合适的君主。

自汉代开始,早期隐逸思想中为了保持本真而宁愿舍弃生命的极端思想开始被人们质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以自己为例说明了伯夷和叔齐所做的选择是一种消极的放弃,真正具有伟大人格的士

①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明律海本。

② [澳]文青云(Aat Vervoorn),徐克谦译,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42-43。

人,应当在逆境中保持坚强不屈的信念,并以己之长起到教化世民的作用。尤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隐逸更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察举制度的影响下,隐逸成了高尚人格的重要代表。东汉时期的隐逸思想在统治者的推动下,日渐成为士人文化中的重要潮流,这似乎是一种双赢的局面。统治者通过优待贤士获得“圣明”的评价,赢得更多的政治支持,而士人们则通过隐逸行为的暗喻成为道德的标杆,得以青史留名。不过,如范曄在《陈寔传》中所言:“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昏,而其风愈往。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①政治的动荡是隐逸产生的基础,而隐逸的自由也是造成政治动荡的因素之一。

唐宋以后,文人有关于“出世”或“入世”的态度已不再像魏晋以前的隐士那样极度排斥了,他们在仕与隐的态度上较为通达,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这两种曾经“对立”的处事态度。所以,在唐宋以后的文人生活中,时事政治也常常成为他们日常谈论的重心。也就是说,无论居住于何地,真正的隐者必须有高尚的品格和情操,他们追求道德的“制高点”,也懂得如何在乱世之中保持自己的人生态度,当充满希望的新时代来临时,他们也会在恰当的时间“出世”,以自己的学识和抱负为政治服务。最关键的是,他最终决定是否“出世”完全不是因为受到强权的胁迫,而是遵循本心、按照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来判断“出世”的时机。彼时,《老子》中提出的“时”与孔子的隐逸主张有近似之处,即真正的君子懂得判断“入世”与“出世”的时机,只有这样,隐逸才真正地成了融于君子骨子内的自然属性,而无造作扭捏的痕迹。特别是在乱世之中,对“时”的精确把握更是大智慧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唐代以前,能够成为“文人”的士子通常都有着相对优良的家世,他们能够更好地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并由此树立起雅致高尚的品格风貌。鲍吾刚曾在《隐士的诱惑:3至4世纪中国和西方隐修的诸面向》中指出,禁欲主义在中国宗教中也同样产生过较为明显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文人们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自我净化的意识,如同《孟子·离娄上》所言:“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严谨虔诚的斋戒冥思,能够帮助恶人净化心灵,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更为纯粹的人,养成更为高尚的品格。因此,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宗教从来都是一种用以休养身心的有效方法,同时,为了能够更快、更好地掌握教义经典,文人们也十分乐于结交学识高雅的僧道门人,与他们交游并畅谈人生的哲理。当然,文人们所倡导的用以净化心灵的斋戒并非俗世大众的那种简单斋戒,自庄子开始,他们所倡导的最为核心的斋戒形式便是“心斋”,即真正的心灵上的净化、道德上的清理才是根本的目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风格高逸的文人虽然在举止上极为狂放,却被后世评价为真正的“高士”。

二 文人品格与艺术表现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艺创作中,古代士人们都追崇“雅”的内容,这一特征至宋代达到顶峰。不过,文人所倡导的“雅”不仅是指艺术境界上的高雅,还是一个与“俗”相对的概念。至于何谓“雅”,何谓“俗”,可谓众说纷纭,但就现有资料来看,无论是写诗作文绵密婉转,还是描摹刻画格调高尚,乃至居室生活淡泊清幽,种种这些有别于一般民众世俗生活的形式表达,似乎都可被称为文人之“雅”。正如研究者所言:“这种脱离利欲超越政治和普通社会的理想境界,往往被元代人士称之为脱世虑、脱尘俗、脱尘杂。……他们所谓的俗,即身外的一切与名和利相关联的东西。他们所谓的尘,即人在社会中所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一切事物。避之逃之,就是追求真正的自由和适性而不受尘与俗的干扰。”^②

1. 艺术形象中的“文人意象”

大多数中国人最初可能都是通过诗歌来认识文人,诗歌不仅有着美妙的文字韵律,还能够含蓄地表达出文人的心绪,因而一直以来都是他们最重要的表达“工具”。同时,由于他们大都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① [南宋]范曄,后汉书·卷六十二,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② 牛贵琥,玉山雅集与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金元文士雅集的典型解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62。

所以在对艺术形式的感悟与欣赏上都有着较高的标准,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诸如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审美引领者的基础所在。同时,正如余英时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的士人总是认为自己不同于统治集团的核心掌控者那样以政治利益为重,自战国时期开始,士人们就被视作启迪社会整体智慧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肩负着传播优秀理念和新思想的重任,然而有时因为他们的主张和提议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过于超前,所以,从世俗的层面上来看,这些思维活跃的士人们似乎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为了充分地展现这种孤独寂寞的心境,文人们积极地寻找各种艺术的表达方式来阐释这种与“俗”有别特质,加之“精英知识阶层鄙视对文艺技巧所流露出的兴趣”^①,因此,无论是吟诗还是作画时,他们都不屑于按照固定的格式去完成自己的创作,而是试图用更新颖、更率性的手法表现自己的胸襟与意气。例如,众所周知,元代是中国文人画发展的成熟期,其标志在于此时的文人不再拘泥于形象的客观存在性,他们在画作中选用的题材或表现的形象很多时候并不存在于这个真实世界中,而是他们心中的理想对象。之所以选择某一种对象来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或环境中,这种对象恰好能够满足画家抒发某种情绪的要求,如感到孤寂时便可使用荒寂的山石远水,志存高远时则可选择挺拔的竹石幽兰等,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单纯地试图在客观事物中寻找“起兴”的点,而是懂得灵活地根据场景和即时心境,创造出源于自然但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描绘对象。

有趣的是,自元代开始的文人画家们始终坚持强调绘画的业余性,这应当是为了将自己与职业画工区分开来,如明代何良俊在《何氏语林》卷十三中所记载的倪瓒之语:“倪元镇不能为王门画师。”除了以主张萧疏淡雅的文人画来表征性格之外,文人们还逐渐选择了一些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的处世态度,例如明代吴门文人常以《桃花源记》《赤壁赋》为意象绘图。此外,中国文人习惯于将自己对某种植物的喜好以文字或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松、竹、梅、兰四者,尤以前三种为最。因为,文人们认为这几种植物隐喻着高尚的品格,当他们歌颂或描绘这些植物形象时,旁观者便能知晓作者想要表达的精神特性。更有甚者,还有宁愿终生与梅鹤为伴、享有“梅妻鹤子”之称的林逋。自元代开始,四君子、山水、树石等皆成为文人品格的典型象征。^②

当然,在中国的传统绘画及装饰题材中,还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文人意象却备受争议的内容,例如“商山四皓”。有关于“四皓”是否为真隐士的争论由来已久。在司马迁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到,“四皓”在汉高祖时期因受到君主粗鲁的对待而选择隐退,但是到了公元前196年,宰相张良又邀请“四皓”出山辅佐太子。对此,司马光、朱熹、钱谦益、全祖望以及王守仁等人都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的隐逸事迹或是存疑,或是不符合真隐士的道德准则,在他们提出的这些反对意见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认为“四皓”当为“赝品”,是张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找来的四位冒名顶替者。当然,除此以外也有冯景、汪昌之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1982年,洪安全在《两汉儒士的仕隐态度与社会风气》中也阐释了将“四皓”定位为真隐士的原因。不过,从图像内涵的角度来看,无论张良引荐的“四皓”是真是假,这一图式所表达的潜在寓意显然都是宣扬隐逸之士高尚的情操与道德,正如研究者所说:“尽管……涉及‘四皓’之真真假假的有关争论还是没有最后结论。这种争论的重要意义或许正在于,它显示隐逸千百年来在中国知识阶层里持续地唤起浓烈的兴趣。”^③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至少在艺术表达的层面上来看,隐逸确实始终深受中国文人们的热爱与推崇,但它究竟应当以何种形式呈现,却并未有定论,而人们之所以乐于采用此类题材,可能多半是因为真正的隐逸实在是难以达到,故而其中反而包含了一种绝对美好的愿景。

2. 文人在艺术史发展中的作用

在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文人们毋庸置疑地起到了极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从古代文人留下来的各类

① [美]艾诺朗,杜斐然等译,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65。

② 对于这个问题,本书在第八章“叶石为照:陶瓷纹饰中的文人映像”一文进行了范例阐释。

③ [澳]文青云(Aat Vervoorn),徐克谦译,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88。

笔记文献中可以看出,他们学习各种艺术技能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以实践的方式来感受自然之道,所谓“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①。对自然的热爱与崇拜无疑也是文人审美的主流趋势之一,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赏石、品花中,也同样表现在绘画、赋诗等文艺创作里。到了北宋时期,士大夫们在艺术追求上天真随性的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他们敢于对前代权威提出质疑,并由此进行艺术改良,创造出许多令人诧异的新艺术形式。如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完成十年之后所作的《洛阳牡丹图》诗中写道“造化无情宜一概,偏此著意何其私。又疑人心愈巧伪,天欲斗巧穷精微”^②,由此表达出对“人工”的质疑。换言之,文人们因为普遍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在见识与审美上通常比普通民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能够敏锐地感知到艺术的魅力与内涵,由此而生发的感触与批评通常也具有社会层面上的引导性作用,同时,这种艺术自觉也逐渐地渗透在他们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塑造出全新的艺术形象和艺术表现方式。

对于以苏轼为代表的那部分文人而言,艺术品的意义不仅不在于它的表现技巧,也不在于它的市场价值,而是在于其中所包含着的内涵与深层寓意,比如作者的高雅品位、完美人格,或是闲适不羁的生活态度与端正的政治理想。由此,他们在艺术创作及赏鉴中也不再极力避免商业化和世俗化的影响,而是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去接纳,甚至于对此著书立说,前文所提欧阳修所撰《洛阳牡丹记》便是其中一例。到了明代,文人们更是将自己的艺术化生活和生活的艺术化经验编撰成书,及至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长物志》《园冶》《闲情偶寄》等著作感受到明代文人精致的生活品位。

纵观中国文人的审美习惯,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始终包含着一个关键性的词语,即“天然”。虽然文人们从来都不排斥雅致的人工制品,但他们却不断地提出“天真质朴”的观点,也就是说,即便是人造物也应当展现出天然之美、自然之趣。因为追崇自然天成之美,历代文人 also 认为那些奇巧玲珑的天然石材有着极为独特的艺术魅力,例如苏轼便曾多次撰文描述其宝爱的一对“仇池石”,值得注意的是,这对石头对于他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审美享受,而是其中所包含的隐逸及闲适之情。^③事实上,这并非个例,文人们认为天然石材夺造化之神气,在寄托以适当的想象之后,它们便成了一种微缩的山水景象,可帮助文人们在书房中享受独自“卧游”之趣。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中国的文人们之所以能够独享“卧游”之乐,多因其善于想象,这种丰富的想象力也造就了中国书画“计白当黑”的特征,以及由“留白”而带来的宏观世界。

三 文人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文人虽以狂放率性著称,但事实上,他们也常常自觉地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自儒家学说为世所重后,这种教化的意义便日渐明显,在他们不羁的外表下,常常隐藏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以李格非为例,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十分著名的文人却留下了一本《洛阳名园记》,这本记载了 19 个知名园林的文献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并非是一本通俗的“旅游指南”,而是其后记中所阐述的“呜呼!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也”。历史也证明了李格非所做的这一反思是正确的,因此,后来邵博在编写《邵氏见闻录》时便将这篇文章收录其中以证其价值,谢枋得的评注“有此文章方可传。不然,虚辞浮语虽工何可传?”^④更为明确地展现出了这篇文章的社会意义。虽然,现代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李格非文中后记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较之正文极为突兀,可能反映了作者的社会焦虑与妥协^⑤。但毋庸置疑的是,尊崇儒家学说的中国古代文人们始终有着较为自觉的社会责任心。

① [宋]苏轼,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苏轼文集·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326。

② [宋]欧阳修,洛阳牡丹图,居士集·卷一,内府藏本。

③ 艾诺朗在《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第 165 页以杜甫诗《秦州杂诗二十首》所提“仇池”说明了这一点。

④ [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卷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1。

⑤ [美]艾诺朗,杜斐然等译,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18。

在艺术与生活的层面上，文人也并非一味地追逐所有的“雅事”，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许多时候，他们并没有能够以实际行动验证自己所有“高雅”的建议。例如，虽然大部分的文人会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文学艺术等“高雅”的方面，但不容置疑的是，自宋代以后，尤其是欧阳修写完《洛阳牡丹记》的五十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关注起日常的生活和有趣的技艺，例如园艺、居室陈设等，并以此著书立说，当然，就目前所知而言，陆羽的《茶经》可能是此类文献的开山之作。换言之，受社会现实的影响，文人们需要权衡利弊，在特定的时段选择性地采用“折中”的方法，以令自己的见解在主流社会中不会显得过于突兀，如对雅俗之分极为热衷的黄庭坚也会在受邀为晏几道撰写词集序言时，尽力以生花妙笔转俗为雅。而拥有士人雅趣典范“独乐园”的欧阳修也会为充满世俗趣味的牡丹认真地撰写《洛阳牡丹记》。当然，有时这种“折中”也许仅是因为个人的心理因素，例如苏轼虽始终主张“不为物役”，但在面对王诜借赏“仇池石”时也因无法割舍而连续撰文三篇，试图劝说王诜改变主意。

事实上，中国的文人从来都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标准”，他们的艺术想望、精神追求以及生活方式从来都是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但是其中却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强调小我、顾全大我。

第二章 十日之饮：文人雅集中的情怀与品位

当代研究者认为：“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精致生活的最高典范，而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雅集却是从依附权贵走向傲视权贵的最高境界。明清以来的文人结社比较简单，不及前朝几个重要转折时代那样高调，不外乎是借饮酒、品茗、赏花、吟诗、书会、侍香、抚琴、唱曲、博古等几项题目集会而已，如果没有这几件事参与其中，注定不是个有情趣的雅集。”^①这几乎已能概括文人雅集的全貌。不过，对于艺术史研究者而言，文人雅集常常可被视作社会的缩影，它们是时代的“风尚”，通过研究雅集文献与相关图像，我们便可探知彼时最为高尚的审美倾向。

一 雅集的历史

自魏晋时期开始，文人之间的雅集活动便已开始成为一股新兴的社会风气，历史上留下记载的雅集不胜枚举，后世所谈最为常见的当属金谷、兰亭、桃花源及西园四者。通常来说，宋代之前的文人雅集总体数量不是特别多，规模也不会特别大，但是到了宋元以后，各种规模和主题的雅集在文人士大夫的交游生活中呈现出井喷的发展态势。以元代为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雅集当属由顾瑛组织的，开展于江浙行省平江路昆山州（即今江苏省昆山市），以玉山之西界溪朱塘里“玉山草堂”为中心的“玉山雅集”。在延续三十多年的雅集活动中，先后有 222 位文人参与其中^②，流传下来大量的诗词文献。至正十五年（1355 年）开始，因受到战乱的影响，玉山雅集盛况不再。但它奠定了此后文人雅集的基本特色，即所有参与者均为志同道合之人，他们既可在雅集中以诗会友，亦可以画怡情……所作之事皆凭兴趣，旨在畅怀，正如刘仁本《朋屿旧隐记》中所云：“余乃日招亲故友生从事讨论，或焚香而鼓琴，或酌酒而赋咏，或挟策而舒啸。幽篁杂蒨，野水孤云，闻伐木之丁丁，听鸟鸣之嚶嚶者，为朋屿之所助也。”^③自此之后，中小规模的文人雅集便在各地频繁地举办起来，如正德十三年（1518 年）文徵明偕六人举办的“惠山茶会”、崇祯元年（1628 年）以张溥为首的“西湖游宴”、乾隆八年（1743 年）马曰琯等人“笥园雅集”和“小玲珑山馆诗会”等均堪称一代风流。

在雅集中，文人们得以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充分释放天性，这种自由的、志同道合的场景，无疑令他们感到放松。而追求轻松快乐的心境同样也是文人生活中的常态，元人叶颙在金华城外十五里结一茅舍自居，日常生活“闭门远尘嚣，绝世虑，惟读古人书。闲暇登兹峰，弹琴鼓瑟，酌酒围棋，宠辱不惊，黜陟不知。凿井耕田，以饮以食”^④，尽显文人居食的潇洒意态。

① 张卫东，从依附权贵到傲视权贵——中国的文人雅集，引自左靖，碧山 04：结社与雅集，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2。

② 牛贵琥，玉山雅集与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金元文士雅集的典型解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9。

③ 李修生，全元文·第 60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352-353。

④ 叶颙，樵云独唱序，引自李修生，全元文·第 60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4：247-248。

二 艺术作品中的经典雅集场景

雅集是历代文士交流情感、抒发才性的特殊场合,他们在这里敞开胸怀,不计较才学的高低,只以志趣相交,弹琴鼓瑟,诗画抒情。文献记载中的文人雅集通常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想象空间,后世每一位读者脑海中构建出来的仪态风流可能如同“观众眼中的哈姆雷特”那样各具特色,但同时流传下来的绘画作品却相对真实地展现出这些雅集的面貌。目前最为常见的题材当属“桃李园”“金谷园”“兰亭集”等,其中所描绘的场景亦曾多见于表现文人闲散生活的画作中,例如,石涛所绘的《西园雅集图轴》(图 2-1)中自右向左便分别描绘了烹茶、联吟、鉴古、交谈、作画、题壁、论禅七类雅集活动,这几个场景几乎已成为“西园雅集图”的标志性内容,马远亦曾在同一主题的作品中细致地描绘过联吟题诗的场景(图 2-2),王振鹏则将联吟、作画、题壁、拨阮、烹茶、论禅几个场景凝聚在了更小的空间中(图 2-3)。有趣的是,因为雅集中的活动通常都是文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片段,因此,如果将这些场景拆分开来,几乎每一幅都可用以描绘文人的日常生活情境,例如,仇英的《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图 2-4)和《煮茶论画图》(图 2-5)等。



图 2-1 西园雅集图轴(局部) 石涛 [清] 上海博物馆藏



图 2-2 西园雅集图卷(局部)
马远 [宋]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
艺术博物馆藏



图 2-3 西园雅集图 王振鹏 [元]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图 2-4 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局部) 仇英 [明]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图 2-5 煮茶论画图(局部) 仇英 [明] 吉林省博物院藏

1. 雅集的主要场所——山水园林

陈方山认为：“无论是金谷、兰亭，还是辋川、云溪，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雅集都发生在园林之中，并且都以园林命名。由此可见，雅集和园林是一种鱼水关系，甚至更为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园林是雅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雅集构成了园林的本质活动。”^①也就是说，精美幽静的园林不仅是雅集的“容器”，同时也是雅集的“参与者”，文人们聚集于园林的一方天地间，坐卧于石上，联诗于松竹间，眼前的一景一物都可能成为他们畅谈的对象，松涛花香环绕着他们，搭配着词曲巧妙地浅唱低吟，撼动着每一位参与者的五官感识。根据学者的研究，顾瑛在界溪朱塘里的住所就是他举办雅集的主要地点，文献中展示出这个私家园林中的主要景点有：“钓月轩，芝云堂，可诗斋，读书舍，种玉亭，小蓬莱，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楼，浣花馆，柳塘春，渔庄，金粟影，书画舫，听雪斋，绛雪亭，春草池，绿波亭（二名一处），雪巢，君子亭，澹香亭，秋华亭，春晖楼，白云海，来龟轩，拜石坛，寒翠所（二名一处），共24处。”^②仅从名称上来看，这些亭台楼阁便已具有了赏心悦目的美感。不仅如此，在所有以“雅集”为主题的古代画作中，我们都可看见人物聚集的场地若非自然山水之间，便必然是一处优雅的园林之内，例如陈洪绶所绘《雅集图卷》（图2-6）中即随处可见奇石怪树，根据其中的蕉叶、雕花花池等亦不难判断此处当为经过人工置景的小型园林。

2. 雅集中的酒与诗

文人雅集的主要内容通常都与他们的文化生活有关，其中比较常见的包括鉴古、抚琴、吟诗、品茗、联词、唱曲等项目，这些形式丰富的活动项目涵盖了味觉、听觉、视觉以及触觉上的享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形式并非单纯地为了满足参与者们的生理需求，在雅集中，参与者们或以诗言志或慷慨陈词，以表达他们对时事政治的批评与建议。而贯穿于雅集中的宴饮则可被视作交谈的助兴之举，特别是宋元以后的雅集，目前尚未见如金谷园的那种奢侈靡费之风的记载，但酒与茶这两种神奇的液体却始终陪伴于文人左右，在雅集中与诗画一起，扮演着特殊的角色：酒能令人放下戒备，在疏狂中表达真性情；茶能令人头脑清醒，在冷静中研判处世之道；诗是文人们的武器，他们将自己对社会、对民生的责任与希望都寄托于唯美的诗词之中，如今，这些文字已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书画则是文人们怡情自娱时最为常见的媒介，他们或通过凝练精粹的笔触抒发着情感，或以萧疏淡雅的笔墨描绘世情。事实上，在文人们看似狂放舒达的外表下掩盖着的往往是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在雅集中，在面对有着相近观点的同道中人面前，这种愤世的情怀被激发了出来，为了抒发这种情感，诗歌、书画都成为他们手中的利器，以玉山雅集为例，其参与者所作的诗歌通常较少出现那种针砭时弊的内容，但不容置疑的是，元代的社会背景始终是他们行文作诗的基础所在。研究者认为^③，这种看似淡漠民生的诗文表现，实际上并非是



图2-6 雅集图卷 陈洪绶 [明] 上海博物馆藏

① 陈方山，园林·雅集的参与者，引自左靖，碧山04：结社与雅集，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23。

② 牛贵琥，玉山雅集与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金元文士雅集的典型解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

③ 牛贵琥在《玉山雅集与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金元文士雅集的典型解析》第86-89页对玉山雅集的价值进行研究时提出这一看法。